

中国巧女故事中的角色类型

康 丽

内容提要:以中国巧女故事为研究对象,从故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考察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的规律,试图将角色类型作为突破点,通过角色研究,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研究与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关联,以便结合两种研究之长,借助结构分析更好地介入意义探讨。

关键词:巧女故事 角色类型 职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民间故事只有在作为基础结构的叙事形态的支持下,承载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意义,才能成为真实的讲述文本并产生吸引人的魅力。这个事实使我们意识到,认识故事的叙事形态,与认识隐伏于叙事形态结构深层的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生活观念,都是故事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二者多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否认将上述两个目的分而治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各自深入地探讨,但这种做法却在更深的意义上,阻碍了对民间故事的全面把握。如何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研究关联,以便结合两种研究之长,借助结构分析更好地介入意义探讨?这是我们应当且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形态的研究以及结构的研究,如果将来不向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发展,不能成为后者的基础和前奏,而只是把它当作自我目的,那么,这种研究只会停留在一定层面上,其价值可能是相当有限的。”^①可见,只有在建立这种研究关联之后,结构分析的功用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回溯二者的研究脉络,我们发现,研究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都是从分析角色行动开始的。^②只不过,前者关注的是角色行动的抽象功能,而后者关注的则是角色行动的具体承担者以及由这个承担者施发或执行的行动对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中其他角色的影响。换言之,对故事的叙事结构而言,角色的最大功用在于他施发或执行了某种能够推进情节发展的行动,至于是谁承担了这一角色并不十分重要。但问题是,在绝大部分民间故事中,角色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处在由多个角色承担者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任一角色的任一行动都有可能对关系网中的其他角色造成影响,甚至导致故事结局乃至整个讲述主题的改变。我们需要借助这个关系网来判断角色的属性。所以,涉及到故事角色的考察,就很难避免这种投射了社会文化的角色关系的影响。由此可以确定,附着于角色能指之上的有两种所指,即结构功能所指和社会关系所指。为了把握类型群中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我们必须暂时将角色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取出来,使角色与其社会关系所指相剥离,这样才能把具体角色的行动转化为抽象的结构功能。然而,一旦这种抽象的功能被置回到故事文本中,就会重新被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其社会关系所指相融合,成为行动承担者的具体作为。这些行为彼此互动,共同传达了民众赋予故事的文化意义。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研究视点从行动转向承担者时,故事角色也就从结构功能意义转向了社会关系意义。从这个意义转向出发,我们找到了可以充当研究关联的中介层面,即故事角色。借由角色研究,叙事形态结构与社会文化意义被统合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叙事形态结构的变化,观察到角色分布与转换的规律;再通过角色关系及其行为互动的设置,找到它与民众观念变更之间的关联,挖掘出民众赋予故事的社会文化意义。

具体而言,民众在讲述民间故事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切身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判断融入其中。但他们很少采用概念或论证等抽象的方式直接传达某种观念,因为这种方式是与口语表述思维的特点相悖离的。相形之下,民众更多的是通过存于记忆中的故事范型传递信息^③,在设置故事角色、安排各角色的行动、行动

反应及行动结果——这样一个事件性的描述过程中，向听众说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思考。这种表述方式为我们探查故事意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故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的特征。下面，我们就循着这条思路开始探索文化意义工作的第一步——故事角色研究。^⑤

故事的主角：巧女的角色类型与职能

我们知道，在民间故事里，有林林总总的各种人物出场，这些出场人物原本有着许多方面的差异，如身份地位的差异，年龄性别的差异等等。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他们会成为数种角色类型，这些类型超越了前述个体的差异。

中国巧女故事^⑥的核心母题——“女主人公智解难题”中包含着两个构成要素，即女主人公所面临的难题和她破题时的智慧。站在结构层面，我们从这两个要素中获得了界定巧女故事的主要依据。当我们转向意义层面，重新审视这两个要素时，会发现它们分别指向了两个与角色相关的重要向度，即角色的性别指向和智慧程度。前一个向度为我们探查隐匿于角色背后的深层寓意提供了突破口，后一个向度则关系着每个角色在不同类型中的具体表现。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巧女故事的讲述看作是一场关于两性智慧交锋的表演，参与这场演出的故事人物可分为四类：巧女、拙女、巧男、拙男。^⑦在巧女故事中，每一类角色都会随类型结构与所述事件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行动意图、智慧程度和出场频率。为区别于角色行动在故事结构中地位意义的“功能”，我们把这些角色行为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特质称为“职能”。

一、巧女的角色类型

作为主人公，巧女是出场频率最高的角色。每个类型的巧女故事中，都能见到她的身影。不过，在不同故事类型的叙述事件里，巧女角色的行动和职能会发生一定变化。就整个类型群而言，这一故事角色几乎涵括了女性在不同生活场域中所承担的各种社会角色：娘家的女儿、小姑，婆家的儿媳、妻子，核心家庭的代言人，以及父系家族的守护者。中国故事里的巧女基本是才貌双全的，她们长得“水灵灵的俊”，而且“心眼儿好使，一点也不嘀咕”。^⑧巧女的智慧是按照民众对理想女性的预期来描述的，体现在心智、手艺和口才三个方面。巧女是操持家务的主妇，面对大家庭的内外关系，她们必须心灵，才能明辨是非利害，持家守戒；手巧，才可领会长辈的意图，做出令人满意的衣物饭食；口利，才会在维护自己和家庭利益时立于不败之地，把对手驳斥得哑口无言。三方面的智慧相互关联，心智是基础而手艺和口才则是破题的利器。依据巧女智慧

在破题过程中的不同侧重，我们归纳了巧女角色的三种类型，即才智型、贤惠型和能言善辩型。^⑨

(一)才智型

从角色分布的角度观察，才智型巧女主要出现在普处事类和善理解类的多个类型^⑩中。故事在展现该类角色的智慧特征时偏重于心智方面，以斗智形式呈现出才智型巧女的破题过程。无论是运用狡辩的方法免除家人的牢狱之苦，以暗示行为逆转家中的不孝状况，还是提出与难题方式相同的要求挫败恶意指衅，抑或是猜出谜底完成测试的任务，她们都是凭借心思的缜密灵巧寻找到破解难题的最佳方法，最终解除了被放置于她们眼前的困境。

就角色的行动方式与破题才智而言，我们可将才智型巧女角色称为女性机智人物。^⑪她们与徐文长、钱三爷、韩老大^⑫等男性机智人物在故事中担任的角色颇为接近，都承担着破题解困的最终职能。二者的差异在于：在男性机智人物故事中，男性机智人物更多的是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现的，与之相对的只有愚笨的一方。他们既可能被动地接受考验，也可能主动地挑战恶人，甚至是戏弄他人。相形之下，巧女则多是处于幕后，纠缠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有可以展现其智慧的行动都是被动发生的。换言之，巧女大都是在其他人（与她同属一个利益团体中的男性成员）失利之后，才会出面处理危机。与她同时出现在故事中的，既可能是衬托其聪慧的愚者，也可能是与她势均力敌的其他智者。

(二)贤惠型

贤惠型巧女角色的出场频率低于才智型，主要出现助夫处事系列、善用小钱发家型和家翁出谜题型中。该类角色的智慧特征分别体现在“贤”与“惠”两个方面，贤在对持家理念的坚持，惠在对各项家务的熟练。换言之，以该类巧女为主人公的故事着力赞誉的重点，与其说是巧女的才智，不如说是她们的品行和生活态度。比如，助夫处事系列故事在强调巧女规劝方法的巧妙之外，更突出地称赞了巧女的“贤良”。又如，在这一则善用小钱发家型故事《三女儿要宝》^⑬里：

大女儿和二女儿得了黄金和白银，心里挺高兴。唯独三女儿在一旁没有说话。

老舅外来到三女儿身旁问道：“小女，你爱的是什么？”三女儿回答说：“大姐爱的是黄金，二姐爱的是白银，小女不识金银贵。勤奋耕织为根本，就把你老的谷子种给俺一升吧。”金舅外听了小女的要求，心中大喜，连声称赞道：“好闺女，懂得发家之本，爹给你一升谷，祝你过个大财主。”

父亲对三女儿摒弃金银而就各种的选择大加赞赏,并称之为“懂得发家之本”,已经明确透露出民众对巧女勤俭持家的期许,这与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对“巧媳妇”的期望也是一致的。^⑤可见,故事对这类角色的塑造,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女性的期待——贤惠与勤劳。此外,这些故事在讲述女性智巧的同时也赋予了角色勤苦好学的品质,用以告诉听者,故事女性主人公的“巧”实际上是勤劳加远的结果。聪明虽有天赋的关系,但智慧的得来,则要靠踏实地学习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熟悉。譬如,家翁出谜题型中要求巧女完成的难题,大都与做饭、纺织、蓄养牲畜等家务相关,如用两种材料做出多样的饭食、用少量的布匹裁制多样的衣物等等。贤惠型巧女倘若没有平日对家务的操持和熟悉,是无法洞悉谜底并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的。

②能言善辩型

能言善辩型也是出场频率颇高的巧女角色,主要出现在善说话类故事中。故事着重强调了该类角色的口才,她们一般会使用谐音暗示、模仿反问或拆分禁忌同音字等方法,或犀利或含蓄地以巧妙的言词化险为夷。这里我们不妨以《巧语斗先生》^⑥为例,试看巧女如何以口才获胜:

五姑娘跟韩老大成亲后,乡亲们就管五姑娘叫“五娘子”了。一年过后,五娘子生了双伴儿(双胞胎),一个小子,一个丫头,长得一模一样,又白又胖。又过了有一天,五娘子背着小子,抱着丫头,回娘家,一进村,正巧碰上本村的教书先生。……教书先生挨个儿看了后,眼眉一挑,笑了笑说:“哈,这两个孩子一摸一样,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先生的儿,还是先生的女呀?”五娘子在村里做姑娘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教书先生爱占女人的便宜。这会儿一听他这么说,心里犯了嘀咕:“哼,啥先生的儿,先生的女?明明是想占我五娘子的便宜呀!那你算走错了门儿咧!她灵机一动,顺口说:“先生是我儿,后生的还是女(你)”。”教书先生讨了个没趣儿,红着脸说:“唔,我还有急事儿,回头见!”说着,转身走了。

在这个隐语嘲人型故事中,教书先生利用“先生”一词的多义,将其对顺序的指代替换为对自己的指称,以此来暗示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占五娘子的便宜”。而五娘子在予以回击时,也同样利用“先生”的多义,并采用了谐音的方式,两次暗示了彼此的母子关系。该则故事中,巧女之巧主要表现在她以言语回击时的巧妙,不仅巧在方法,更巧在最后的效果,如此含蓄地嘲

讽使教书先生在吃亏之后只能隐忍而去,却无法发作。

如前文提及的,巧女智慧的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依的,无论其中的机智表现偏重于哪方面,都离不开她们巧嘴的阐释。能言善辩型巧女的存在,足以说明故事对巧女口才的重视。这里,我们不妨就此来回顾一下故事与实际生活的关联。我们知道,巧女故事是老百姓拘泥于一定时空下对现实生活的摹写。他们对生活的某些看法或认识会投射到故事之中。笔者从田野访谈中得知,老百姓家中的长辈,虽然强调“嘴好使,不干活计不行”,但又无一例外地都喜欢“嘴甜”的媳妇,认为“练胳膊练腿不如练个好嘴”。^⑦既然在日常生活里口巧对于女性而言同样重要,这就说明能言善辩型与贤惠型一样,其角色塑造中也投射了民众对理想女性的期待。

如果我们把能言善辩型巧女角色的出现放置在文化语境中加以探究,就会发现,强调巧女的口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话语权对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性。传统中国是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男子毋庸置疑地掌握着各个层面的话语权。但在巧女故事里,男性对家庭话语权的掌握,却在他们与巧女的智慧交锋中被部分削弱或彻底转移了。尤其在那些因巧女口才(话语)而取得胜利的故事中,家庭话语权确实由男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女性转让了。虽然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并未掌握这种权利,如她们所言“老爷们在家,那敢言语,多言多语地招骂”。^⑧但故事中的权利转让,至少能让那些讲述和聆听故事的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在意料之外扬眉吐气。

故事中家庭话语权在两性之间的转让,是通过巧女成为家庭利益代言人的方式来体现的。在巧女故事中,三种类型的巧女角色都参与了家庭话语权的转让过程。家庭话语权的掌握,关系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形象与声望,所以老百姓是异常慎重的。让女子代言之前,故事必定设置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前提,即现有家庭代言人的失利,以及其他继承人的能力匮乏,由此可以明确,女性并不是代言人的首选。然而,一旦女子通过能力考核获得家庭话语权,那么在民众的想象中,这些灵巧女子的话语不仅会庇护家庭,更能预知家庭或家族的祸福。比如《第三个新妇》^⑨中,小儿媳的话语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预测能力。她三年未同家人讲话(除了丈夫),开口后的每次讲话虽然都不合情理,如拔掉长得正好的嫩稻苗、往家里带石岩等,但每一次都为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虽然这则故事是由家翁出谜题型与识宝型拼合构成的,但其主体还是巧女故事。故事情节带有明显的想象色彩,刚好符合了民众用故事弥补现实不足的创作意图,也证实了民众对女性话语权的好奇和敬畏。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故

事表达了男性权威地位的丧失。因为巧女们在台前扮演的危机情况下的代言人。作为代言人,社会将对男性的行为期待赋予巧女,她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已经偏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性别。所以由幕后走到台前的巧女是作为男性的女人出现,而非作为女性的女人。也就是说,社会认可的家庭权威仍然属于男性。

二、巧女的角色职能

我们可知,巧女在故事中承担着多重职能,最主要的是作为解困者以破题的行动达到解困的目的。依据各类型叙述事件的不同需求,巧女的破题行动可以用不同方式予以表现。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充当考验者,以实施考验的方式破解难题。这种职能形式比较少见,只出现在行善型、选婿型和妙解隐喻型问难题亚型故事中。第二种,作为被考验者,直接出面破解难题。这种职能形式一般存在于不包括“求助”范型的巧女故事中。第三种,承担代言人的职责,以代言的形式协助他人破解难题。它与“代言”范型相匹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职能形式。

在巧女故事这一类型群中,类型组编^①的实现标志之一是考验关系的转变,而巧女的各种行动都包含在考验关系中。因此,巧女角色的三个类型及其职能的各种表现形式,在类型组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重合或转换的情况。譬如,在《聪明的姑娘》^②这个由家翁出谜题型、以难制难型和妙解隐喻型连缀而成的故事中,三个类型的连缀就使巧女的职能形式发生了转换。我们先来看看处在故事开始部分的家翁出谜题型:

有一天,三个媳妇把回娘家的事对爹爹讲了,老头说:“你们要回娘家可得,但是要一道去一道回。大媳妇去住过三五天,二媳妇去住过七八天,三媳妇住过半个月。”另外,他还叫大媳妇带四两苍蝇翅膀,二媳妇带四个红萝卜,三媳妇带四个无头无脚的团鱼回来,并嘱咐三个媳妇不要忘记。

三个媳妇高高兴兴地走了,在路上她们问你问我,我问你,几时回来?带什么接意?可是谁也答不出来,她们就坐在路上发愁。这时路旁有一个做活的姑娘,走上来说道:“嫂子,你们为么事坐在这里发愁?”三个媳妇就把爹爹说的话向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想了想说:“嫂子你们都是住十五天才回家呀!”三个媳妇问道:“姑娘,那么样都是十五天呢?”姑娘说:“三五不是一十五,七八不是一十五,半个月就是十五天叫。”她们笑着点了点头。三个媳妇又说:“那我爹爹叫我们带的接意是么事呢?”姑娘又想了想说:“苍蝇翅膀是茶叶。”大媳妇笑着说:“我娘家就是做茶叶的,莫说四两,要四斤也有。”姑娘说:“红萝卜是鸡蛋。”二媳妇说:

“要鸡蛋那好办,我娘家多的是鸡。”姑娘说:“无头无脚的团鱼是荞麦把。”三媳妇说:“那我娘家也多得。”三个媳妇道了谢,姑娘就走了。

三个媳妇在娘家住了半个月,各人把接意带回来,老头看了非常满意。他回头一想,往日三个媳妇有得这样聪明,为么事一下子都开化了呢?不免来问一问她们。便道:“你们都住半个月回来,都带回我要的接意,是你们想的还是那个说的呀?”三个媳妇把经过向爹爹讲了,老头暗地佩服那个姑娘聪明伶俐,心想:“她如果是给我四儿子做个媳妇该多好哇。”于是,他托这个,又托那个,去为儿子说亲。事也凑巧,一说就成了。过了几天,就把那个姑娘接进门来和他儿子完了婚。

在这个类型中,巧女并不是从故事一开始就出现的,直接面临公爹谜题式考验的是老头已有的三个媳妇。她们因无法破解谜题而发怒,造成了“失利”——这个巧女代言的惯有前提。于是,巧女借由发现三个媳妇的“困境”正式出场。从智慧展现层面看,这个类型中的巧女是以前智慧型的角色出现的,她的具体职能是作为代言人,协助三个媳妇破解公爹所出的谜题。接下来是位于故事中间部分的我的东西更值钱型:

老头又添了个聪明的儿媳妇,他不晓得多喜欢,于是他到处酬神谢恩。有一天,他去庙里烧香,一不小心把和尚养的猫子踩死了。和尚见时骂菩萨送上门来,便说道:“老头,你把我的猫子踩死了么样说呢?”老头说道:“师傅,我买个猫子赔你咧!”和尚说道:“老头,我这个猫子不比别的猫子咧!它行像个龙,坐像个虎,要值银子五千五。”老头听和尚这样说,吓得往家里跑。和尚说:“你跑也跑不祥,过三天到你家来要银子。你没有银子就赔猫子。”老头跑回家里急得没有办法,躺在床上连饭也吃不进去。第四个媳妇问道:“爹爹,你为么事急得这样呢?”老头就把在庙上的事向她讲了。四媳妇说道:“爹爹,你不要着急,和尚来了我自个有办法打发他走。”

到了第三天,四媳妇拿了个旧水瓢放在门口内,将大门半掩半开,她坐在屋里等着。过了一会,和尚果然来了,一进门就把水瓢一脚踩破了。他不以为然地问道:“姑娘,你爹爹到哪里去了呀?”四媳妇说道:“你找我爹有什么事呢?”“你爹爹把我的猫子踩死了。”“那我赔你一个猫子就是了。”“那赔我的猫子不到吧,它行像龙,坐像虎,要值银子五千五。”“那赔你五千五百两银子好办,师傅,那你要赔我一个水瓢哩!”“你这个破水瓢还赔不

到咧!”“我的水瓢呀,仆到能切肉,仰到能装粥,要值银子六千六。那你还倒找一千一咧!”和尚一听,调头就跑。

在这一类型中,巧女也没有在故事开始时出现。虽然故事中的考验者与被考验者的承担角色发生了变化,即考验者由公爹变为和尚,被考验者则由三个媳妇变为公爹,但巧女的角色职能没有改变,仍是才智型的角色作为代言人协助被考验者破解难题的。与上一个类型不同的是,巧女代言的方式有所转变,从前一个类型中的“告知答案”变为此类型中的“直接出面”。下面是位于故事结尾部分的妙解隐喻型:

老头见四媳妇聪明过人,就在门前挂了个“万事不求人”的牌子。一天,一个初去上任的翰林路过这里,看见这块牌子感到惊奇。他走到屋里一问,才知道是老头为四儿媳妇聪明伶俐挂的。翰林说道:“我今天要你媳妇说四句话,并把行时早,行时迟,不行时,正行时说进去,如果说得好,你就把这个牌子挂到,说得不好,就不许挂!”四媳妇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上前说道:“大人,你听到,甘罗十二位宰相,为行时早,梁颧八十二点状元,为行时迟,我家挂牌子遇着你,为不行时,老爷今日去上任,为正行时。”翰林不说二话,打马就跑。

在这个类型中,巧女以才智型的角色,成为了直接出面破解难题的被考验者。导致考验出现的是公爹挂牌引起的“巧名外传”,他作为传信人,将有关巧女智慧的信息传递给本类型中的设困者和考验者,即路过的翰林。

当我们把三个类型中的角色变化连缀起来看时,不难发现,随着类型的组编,各类角色的职能都出现了转换。仅就巧女而言,虽然角色类型一直保持着才智型,但其职能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换,即从协助破题的代言人改变为接受考验的被考验者。至此已经能够说明,类型组编对角色职能的转换确实存在着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里面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情况。这种复杂性^⑥可从该故事巧女角色的职能转换过程略窥一二:若以类型为限,巧女角色在故事的三个类型中都只有一种稳定的职能,故而可以确定,是三个类型的组编为巧女职能提供了转换的契机。不过,在故事前两个类型中,巧女的职能并未转变,只在代言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类型组编与职能转换之间不存在完全确定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出现类型组编的故事中,巧女角色的类型和职能只是有转换的可能,并不存在绝对的转换。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故事的叙事结构越复杂,参与组编的类型数目和组编形式就越多,可能出现巧女角色类型及其职能表现形式就越多,就越越频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巧女角色是民众现实思考与故事想象的结合。其角色的三种类型基本上分布在不同的故事类型中,强调了巧女智慧显现的不同层面。该角色在故事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承担了多重的角色职能。各职能以破题解困为核心,依据叙述事件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巧女以代言形式破解难题是其中最为突出,也最富有蕴意的职能。它意味着:巧女恪守伦理规范的谦卑,在特殊情况下站到台前的锋芒毕露,都在故事的把握尺度中。巧女作为男性的女人,可有适度的个性张扬;作为女性的女人,她们的言行举措又必须在伦理文化的规范之内。

故事的配角:其他人物的角色类型与职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故事的主角一直占据着学者的视线^⑦,使他们较少顾及故事中的其他角色。实际上,故事中的其他角色与主角一样,在推动情节发展及丰富故事趣味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在逐一分析每一类角色及其职能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在故事结构中的功用,以及他们与主角之间的关系。

阿克塞尔·奥尔里克对民间故事叙事规律,尤其是关于对照律的阐释——“对照律产生于叙事中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人物,这些人物的特征和行为,是由他们与主人公的特征和行为相对照的要求所决定的。”^⑧——使我们认识到,如果将巧女看作故事的主角,那么拙女、拙男与巧男就是映衬主角或与之对照的配角。下文,我们将对这些角色及其职能在故事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讨论。

一、拙女角色及其职能

拙女是与巧女对照最为明显的角色,这类角色的出场频率不高,只出现在四个类型和亚型中,即我的东西更值钱型、摔碗劝孝型、善用小钱发家型和家翁出谜题型选当家人亚型。在前两个类型的故事中,拙女的表现是狡诈的。这类拙女多由巧女的婆婆或邻居充当,她们为着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利益成为了巧女的对手,在实施了恶意考验之后,最终被巧女挫败。

与之相比,出现在后两个类型中的拙女,则是属于愚笨忠厚型的,多由巧女的妯娌们扮演,其主要职能有两种:第一种职能是引发比赛,并在比赛中以自己的失利陪衬巧女的胜利。譬如,在家翁出谜题型选当家人亚型中,家翁之所以采用出题考核的方式选取当家人,也是为了避免妯娌相争引起家庭不睦。正如故事中所说:“老汉觉得操持家务显得吃力。……几个新婢当

中,要数新婢是个治家的料子,但她是新婚媳,又是排行最小,选她当家,恐怕做嫂子的不服,老汉常为这事发愁。”^⑩可见,故事虽对拙女用墨不多,但她们却是推进情节发展的力量之一。

第二种职能是因失利而求助于巧女,为其代言设置了铺垫,将巧女于幕后引至前台。附加在这种职能之后的,还有传信人的职能,即她们通过“求助”将考验的难题转嫁到巧女身上,同时通过外传其巧名,导致了巧女身份的转换。比如,在前面引用过的《聪明的姑娘》故事^⑪中,拙女出现位于故事开始部分的家翁出谜题型。三个媳妇不能理解公爹的要求(失利),只能“求助”于路旁做活的姑娘。在姑娘的帮助下做到了公爹的要求。至此,拙女们完成了第二种职能,为巧女的出场做好了铺垫,但拙女角色的职能并没有结束。在故事的发展中,她们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公爹,使公爹欣赏姑娘的聪明,于是把巧女娶为四儿媳。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在公爹和姑娘之间建立一种信息的传递,既把难题传达给姑娘,又将巧名传达给公爹。从本文掌握的故事资料看,拙女在《聪明的姑娘》中两种职能的顺连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总体而言,故事对拙女的存在没有过多地贬斥。多数拙女的心情是好的,不够精明但还老实厚道,她们尊重家翁的选择,不会刻意地去争夺当家权。虽然有些故事里,拙女是略带了些奸诈的影子。但故事总会安排某个转机,让她们重回那个憨厚老实的模式中。这种性情回归的安排,有着老百姓对家庭和和睦的期待和他们对理想家庭模式的想象。比较拙女角色两种类型的出场频率,我们还能发现,拙女与巧女之间的行为互动更多的是竞争与互助,而非正面的冲突。

二、拙男角色及其职能

拙男是智慧交锋中趋于劣势的弱者,通常由巧女的丈夫或兄弟扮演,分布在三类巧女故事的多个类型中。^⑫这类角色往往是故事情节拓展的一种中介人物,他们承担着传信人的职能:将考验转嫁到巧女身上,为巧女出场设置铺垫;外传妻子或姐妹的巧名,引来外人的挑衅;带回恶意的礼物,导致一些不快后果的发生,如妻子的出走或意图自尽。从故事中描述的心情看,他们是一类老实过头的男人:不谱世事——外出事宜需要妻子或姐妹的事先交待;缺乏判断力——不能明辨他人行为的善恶;能力匮乏——无法妥善地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询问清楚就把财物给人,带回讽刺妻子的礼物等等。拙男在故事中一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他们的失败是夸张的。通过这种夸张,故事呈现了这样一种事实:拙男无法成为强势的家庭利益保护者以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期待,他们需要他人的帮助或庇护。这就为巧女求助于了合理的缘由,同时也

暗示了女性在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幕后导演。

三、巧男角色及其职能

巧男是出场频率仅次于巧女的故事角色。^⑬他们是社会权威的中介表达者,巧女需要经由他们的肯定而获得相应的身份或赞誉。巧女与其对抗的过程,正是显示巧女智慧与能力的过程。依据巧男行动意图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个类型:权威测试型和无理挑衅型,前一类型主要由家中的长辈担任,后一类型多由外来者担任,分别充当善意的考验者或恶意的对手。具体而言,巧男角色的主要职能是实施考验和设置困境,他们的扮演者一般都是有一定才学的,如秀才、教书先生、和尚、县官以及经验丰富的家翁等,但精明有余厚道不足。作为考验者和设困者,几乎所有的争斗都是由巧男挑起的,区别仅在于目的的善恶之分。家翁为选拔持家者的测试,是善意的;秀才、和尚等人因不信任女性才智的出谜或比赛,以及意图调侃巧女的赛诗,就有恶意之嫌了。虽然在有些故事中,巧男赢得了交锋的最后胜利,但巧女的失利更多是迫于文化压力而非男性的智慧。^⑭

与巧女相仿,类型组编也会造成巧男在角色类型与职能上的重合或转换。二者的差别在于:巧女角色类型的同时出现,多半意味着其职能之间的相互转换;但当巧男的两个角色类型,即权威测试型和无理挑衅型同时出现在一个故事中,并不代表其职能的转换。只有在故事事件的发生场域从家庭内部移至外部,巧男身兼考验者、被考验者、传信人等三种职能时,才有可能发生职能的转换。《斗口》^⑮故事由家翁出谜题型、巧对无理问型和隐语嘲人型组编而成。故事事件在前两个类型的连缀中,从王老二父子之间的测试转变为王老二与邻村骑马人之间的难题对答。这就使前一个类型中的权威测试型巧男——王老二从考验者变为被考验者,并通过向儿媳“求助”成为传信人。后一个类型中的无理挑衅型巧男——邻村骑马人则自始至终地充当着考验者。可见,《斗口》故事中的巧男既有角色扮演者的变化,又有角色类型上的变动,还有其职能在实施考验、接受考验、传递信息三种行动之间的转换。

回顾上文对巧女故事四类角色的分析,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首先,从角色之间的关系看,巧女是故事的主角,所有的人物设置和角色变换,都围绕着她们的存在而进行。故事安排拙女、拙男和巧男出场,是出任“表演”中的配角。虽然三类角色参与考验关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主要任务都是陪衬巧女。作为一种衬托,配角的存在为巧女能够或必须站到台前提供了机会。通过与配角的抗衡或协作,巧女真正成为了解困行动中的成败主导者和智慧代言人。

其次,从角色职能及其内部关系看,各类角色的职

能主要有六种,即设困者、考验者(对手)、被考验者、解困者、传信者和代言人(助手)。其中,设困者与考验者可能由同一角色通过同一行动完成^①,而其他职能则基本由不同行动完成。

表1 巧女故事角色及功能对照表

角色	行动	功能
巧女	设置困境	设困者
拙女	实施考验	考验者/对手
巧男	接受考验	被考验者
拙男	破题解困	解困者
	传递信息	传信者
	协助破题	代言人/助手

再次,从角色与其职能的对应关系看,在本文研究的故事资料中,具体到每个故事,角色与其职能之间会出现多向性的对应关系,既可能由一个角色先后执行数种行动并承担其职能,也可能由多个角色先后执行同一种行动并承担其职能。这就说明,在同一个角色身上可以出现多个职能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与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越简单,故事范型与序列的数目也就相应减少,角色类型出现的就越少,其功能转换的频率也就越低;相反,故事情节的发展越复杂,类型组编形式越多,故事范型与序列的数目就会随之增加,角色类型的出现也就越多,功能转换的频率也就越高。由此,我们可推断,角色出场数目及角色职能转换频率的变化,与范型序列数目及类型组编频率的变化直接相关,二者之间的比率是成正比例增长的。

最后,从各类角色的分布状况看,每个故事最少存在包括巧女在内的两种角色,以及考验者、被考验者和解困者——这三个可以支撑故事基本范型序列的角色职能。可以这样说,是角色行动及其职能的相互链接共同完成了故事的叙述。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有填充了角色的行动与职能之后,巧女故事的叙事结构才能呈现出隐匿于其后的深层寓意。

注释:

- ① 刘魁立,《刘魁立致稿回函二函》(2002年12月28日),《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论集》(内部资料),第44页,2001年4月。
- ② 我们试图从故事角色的行动出发,追溯叙事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研究之间的关联。这种尝试的进行,源于普罗普对其学说之核心概念——“功能”的说明。普罗普曾指出:“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谁做的以及怎样做——这只不过是附带研究的问题”。从这一界定看,普罗普对角色的重视,更多地侧重于角色所承担的功能意义。但是我们在

巧女故事,乃至其他生活故事的解读中发现,故事角色做了什么固然是重要的,但谁是这些角色行动的承担者,这些行动对角色关系有何影响也同样具有着重要价值。故事角色从不同侧面同时影响着故事的叙事形态与文化意义——故事中的角色及其行动分布关系着故事情节形态的变化,因为导致形态变化的结构组织单元(母题与故事范型)都是由角色行动构成的;而对角色及其行动的选择或设置则关系着民众观念的变更,因为它们都是能够体现民众思维模式以及现实思考的要素。以上,就是本文的理论基点。引文出自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第29-31页,1928年,转引自贺敬:《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以〈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俄罗斯故事论〉为重点》(博士论文未刊稿),第20页。

- ③ 约翰·迈尔斯·弗里曼·瓦尔特·翁《基于口传的思维 and 表达特点》一文所作的题注,第18页,《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总第79期)。
- ④ 笔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巧女故事叙事形态研究——兼论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中讨论了将角色研究置于叙事形态与社会文化意义之间充当中介的原因。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不能详谈,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研究可供借鉴的学术成果。就民间故事研究领域而言,成果丰硕的首推普罗普。普罗普关于角色的分析,是其故事形态理论与功能论紧密相关的另一重要方面。他确立了“故事人物/角色”的区分理论,将故事人物划分成七种角色,即反角、帮助者、助手、被寻求者、差遣者、主角和假主角。同时,依据对俄罗斯故事的分析,设定了与七种角色相对应的行动场。本文对巧女故事角色的讨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上述理论成果。笔者对普罗普角色理论的认识源自李扬的转述,详见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第252-26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⑤ 概括而言,学界对巧女故事概念内涵的界定大体一致,但在概念外延的设定上,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分歧。但无论是狭义说还是广义说,二者同时肯定了一个事实,即从严格意义上讲,巧女故事是一个储量丰沛的类型群。本文倾向于巧女故事的广义外延说,即不严格限制该类故事的外延,故将巧女故事界定为:在以家庭或家族问题为中心的语境中展开的,以展现故事女性主人公聪明才智为目的的生活故事。构成该类故事的基本因素包括:女性主人公的身份、考验方式和破解难题的智慧,其中“考验方式”囊括了实施考验的主体、困境设置、难题种类、解题方法和考验结果五个基本环节。
- ⑥ 本文使用“巧拙”的概念,是从品性与智慧两方面判断的,不单指一般意义上的机智和愚蠢。
- ⑦ “嗔哈”是河北深县的方言,意思很复杂,在表示与聪明、善良、朴实、开明等相反的性格时都可以用这个词。
- ⑧ 本文区分巧女角色的类型,是为了便于在整个类型群的范围内把握这一角色的多变。各巧女角色类型在某些结构复杂的故事中,会出现重合的现象。
- ⑨ 笔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在将巧女故事界定为故事类

型群的前提下,依照故事文本展示的难题种类、巧女破解难题的方法及其智慧展现之间的关联,将巧女故事分为善处事、善说话和善理解三类,并在各类归属下分别归纳出十一个系列、三十二个类型。本文所涉及的各巧女故事类型皆出于此,下同。

- ⑬ 祁连休与冯志华在其编著的《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荟》中,将巧女等同于女性机智人物,并划分出两个类型,即农村村姑型机智人物和才媛型机智人物。笔者不同意在巧女与女性机智人物之间划上等号,这种作法意味着将巧女角色简单化。
- ⑭ 徐文长是汉族地区影响最大的机智人物形象之一,在民间故事中,多数作品将其塑造为一个性格狂傲、愤世嫉俗、敢于对抗官府和嘲弄豪强的文人型机智人物,某些作品则将其作为无聊文人来描写,他的原型为徐渭,是明代文学家 and 书画家。这一男性机智人物与本文收集诸如钱六姐等以文才显示智慧的巧女有相似之处。钱三爷和韩老大都是出自艺术虚构的劳动者型机智人物,他们与大多数巧女故事中的才智型巧女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 ⑮ 《河北民间文学——宁晋县故事卷》,第 292—293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⑯ 作者在陕西宝鸡陈村桥镇曹家庄村进行女性日常生活的田野访谈中了解到,老百姓认为会过日子的媳妇就是“巧媳妇”。所谓会过日子,包括擅长料理家事、为人勤劳肯干、善于精打细算等。这一结论源自作者于 2002 年 8 月 18 日的访谈记录整理,被访谈人包括:萧腊怀,女,41 岁,初中文化;党迎秀,女,不识字;李朝英,女,51 岁,不识字。
- ⑰ 《韩老大与五娘子》,河北省唐山市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第 161—162 页,1986 年 7 月。
- ⑱ 在唐山地区的方言中,“女”与“你”是同音的。
- ⑲ 讲述者康素莲,女,63 岁,高小文化;讲述时间:1999 年 8 月 15 日;讲述地点:河北深县高各庄村康玉贤家;采录人:康丽。
- ⑳ 讲述者万桂枝,女,75 岁,不识字;讲述时间:1999 年 8 月 16 日;讲述地点:河北深县高各庄村;采录人:康丽。
- ㉑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故事卷》,第 466—468 页,永嘉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内部资料)1989 年版。
- ㉒ 民间故事文本的变异源于讲述人在具体讲述语境中的重组“新旧”,即故事中原有的母题和情节在结合新材料后被重新编排顺序。这个重组的过程反映在文本的结构上,就是复合故事的类型重组。故而,本文将“类型重组”这一概念界定为:范型序列以不同形态进行的排列重组。具体而言,就是不同类型的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发生的情节或母题上的转述与复合。
- ㉓ 《湖北省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之三——(黄冈地区)湖北省民间故事传说集》,第 79—81 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

北省分会 1981 年版。

- ㉔ 关于这种复杂性产生的原因,我们能够从文本获知的是故事所述事件的不同需求,但相信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在此不做过多的涉及。
- ㉕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对故事主角进行探讨一直是该领域的重点之一,相关文章也比较多见,比如祁连休的《汉族机智人物试论》、《机智勇敢的劳动者形象——〈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序言》,李霞的《破坏与维护——从“笨女婿”故事看中国男子的心态及笑话的功能》都是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
- ㉖ 阿克塞尔·奥里克:《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等译《世界民俗学》,第 190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㉗ 《巧选当家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第 699—702 页,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1998 年版。
- ㉘ 巧女故事中的各类角色经常出现在同一故事中,所以本文就不过多地进行文本的举证。为了行文的简洁,在需要其他文本的例证时,也尽量采用梗概式的叙述。
- ㉙ 拙角女主要出现在代解国系列、赛诗系列、出言得胜系列中的免赔型、解隐谜系列中的协助买物或买物型、遇到和丈夫一拌架的人型等几个类型中,以其出场频率看,他处于巧女与拙女之间。
- ㉚ 巧男基本上分布在三类巧女故事的多个类型中,主要包括:代解国系列、善用小钱发家型、赛诗系列、谜语系列、出言得胜系列、解两难之题系列和解隐谜系列。
- ㉛ 比如,在遇到和丈夫一拌架的人型中,巧女在与巧男进行正面斗智(猜出谜底、索回财物)时,都没有失败。但是,从故事的整体发展看,巧男却是左右事态发展的关键人物,只不过他们用来驱动巧女行动的不止是巧男的智慧,更多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伦理规范对女性的束缚,如《卖牛》中,让巧女改穿打八刀(离婚)主意的就是“一女不嫁二夫”的贞节观念。
- ㉜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邯郸地区故事卷》,第 378—379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 ㉝ 在大部分包含“恶意挑衅”母题的故事中,设困者与考验者的职能是重合的,两种职能通过“恶意挑衅”的行动同时完成。但在选婿型和妙解隐喻型问题型中,设困者与考验者则分别由巧男与巧女借由不同的行动完成。以选婿型为例,家人(父母或兄长)的行动造成一女多嫁的局面,设置了无法履行婚约的“困境”,所以家人承担了设困者的职能。巧女为了解除困境以考核的方式选择配偶破解了一名多嫁的难题,承担了考验者的职能。可见,两种职能在这一类型中是分离的。

【责任编辑:高荷红】